

汉字“爱”：语义内涵和修辞认知

李晶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本文拟通过对《康熙字典》中“爱”字词典义的探究，试论述汉字“爱”的语义内涵和隐喻认知。

【关键词】爱；《康熙字典》；字典意义；字义内涵；修辞认知

在日常生活中，“爱”字已被普遍而广泛地使用，评价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经常说“这个人很有爱心”，热恋的情侣经常说“我爱你”，电影中经常充斥着“爱欲”的镜头……这些言语和行动多多少少被冠以“爱”的名义，然而汉字“爱”究竟有什么内涵？本文拟通过探究《康熙字典》中汉字“爱”的释义，试着阐述其语义内涵。

从现有的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出古人对汉字“爱”的理解是复杂、多义的。通常认为，词典对词的释义属于概念认知，而人们理解词典概念后，词的语义通常会带上了个体化、感性的修辞认知。谭学纯教授认为“概念认知概念化地锁定对象，修辞认知审美化地展开对象，重返语言的诗意”即修辞认知“一方面发现概念认知没有赋予的意义，另一方面遮蔽概念认知已经赋予的意义。”通过对“爱”字古义的梳理，可以发现《康熙字典》对汉字“爱”的字义概括地最为齐全。在《康熙字典》中“爱”处于【卯集上】【心字部】，释为“仁之发也。从心无声。又亲也，恩也，惠也，怜也，宠也，好乐也，吝惜也，慕也，隐也。又姓。宋刺史爱申。”用现代汉语解释《康熙字典》中概括的“爱”字的字典意义，即“爱”是仁义的发端、关爱、感恩、施与人恩惠、同情、宠爱、喜欢、小气、赏爱、暗自可惜、作姓氏等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汉字“爱”的理解是深刻而丰富的，且汉字“爱”在古代就具有十分生动的语义内涵。

“修辞活动是主体经验和社会文化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修辞话语作为外在世界的文化镜像反映在主体心灵屏幕上，它所折射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凝固为个体的记忆，也在某种程度上凝固为超个体的认知模式。”通过分析汉字“爱”在《康熙字典》释义，可以发现以下汉字“爱”有着三个重要的语义内涵：

1、分析汉字“爱”的语义系统，很容易发现作为姓氏的“爱”语义单一，并与其他各义项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应归为“爱”的同音同形字，不属于“爱”的多义系统。从《康熙字典》中“爱”的释义可看出，“爱”这个字，有一个中心义项，其余的义项基本由其派生出来的，各义项之间有着显性与隐性的联系，有的从核心义素的蕴含义素发展而来，有的从蕴含义素中联想、演绎而来，各个义项间的联系还是相对比较紧密的，也比较容易理解的。“爱”的本义应该是从内心情感出发的对人对物有着很深的感情，即《康熙字典》中释为“好”的义项，而这个义项释为喜爱、喜欢，其他所有的意义应该都是由此基本义引申出来的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语义联系。属于直接引申的意义有“恩（感恩）、亲（关爱）、怜（同情）、惠（施与人恩惠）、宠（宠幸、宠爱）、慕（赏爱）”，而间接引申的意义应该是吝惜（小气）、隐（隐惜）。直接引申义是直接由汉字“爱”的基本义中的蕴涵义素发展而来，这很容易理解；而间接的引申义则由汉字“爱”的基本义中联想、演绎而来，是需要经过仔细思考的。但总的来说汉字“爱”的几个义项，语义上总有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由一定的核心义素贯穿其中，把看似无序的排列相互

联系，使这几个义项共同构成“爱”的多义系统。

2、无论汉字“爱”有何种义项，这些义项中总包含着一个明显的义素，那就是从内心情感出发对人对物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绝大部分是正面、积极的。有“爱”的人总是对世间万物、人情世相有着较为敏感的感性认识，且能通过感性认识转化为或感性或理性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通常表现为行为或言语。如在《康熙字典》中汉字“爱”被释为“仁之发也”这表明古人把“爱”的行为提高到人格品质的修养，并把“爱”作为儒家最高的美德“仁”的发端，因此坚持不懈地践行仁爱，久而久之可以转化为人的内在的品质与性格，而最终形成个人的道德品格。在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汉字“爱”释为“行兇”，即把“爱”定义为通过主体行动，用行动来表达内心深切的感情，即对人对物要施行恩惠。《尔雅》：“惠，爱也”。爱就是给人或事物以好处，怀着造福别人、使别人幸福的心来行使有利于他人的言行，用心付出。《广韵·代韵》：“爱，怜也”。爱即同情，把自己放在别人所遭遇的情境中去感受，从而获得相同的情绪体验。这些都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从内心出发的对人对物的态度。

3、“爱”的内涵在古人的概念中以褒美为主，“爱”字有明显的褒美色彩。“爱”与“仁”组成仁爱，“爱”与“慕”组成爱慕，“爱”与“恩”组成恩爱，“爱”与“怜”组成爱怜，“爱”与“亲”组成亲爱等，这种褒美色彩往往体现了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关注和自身人格修养的要求，也体现了人最原始的内心情感和心理需求。《康熙字典》中对“爱”的解释是仁义的发端、关爱、感恩、施与人恩惠、同情、宠爱、喜欢、赏爱等，这都体现了古人对“爱”的言语或行为的一种褒美。“爱”也是古人对践行“爱”的行为的一种规约与审美隐喻，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礼记·大传》：“爱，仁也”。仁与爱互训，即施行仁义就是爱。《孝经·谏诤章疏》：“爱者，奉上之通称。”这里的“爱”又可以理解为对长官、老者尊敬的感情的通称。苏武《诗四首》：“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爱，特指男女间有情。这些“爱”的情感都是从内心出发，把“爱”的行为和言语不断地扩大，使“爱”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展，从而汉字“爱”的语义不断丰富。而少数略带贬义色彩的义项，如吝啬，则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过犹不及”，即当对某事某物的喜爱超过了一定的度，体现为对自己以外的人要占有该事物的不舍、嫉妒等极端情绪，当然这个“吝啬”之意也是“喜爱、喜欢”中引申出来的。

总之，汉字“爱”在古代具有非常丰富的语义内蕴，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爱”的语义内涵已深深地渗透进中国人的骨髓，其多义系统涵盖了古今人类广博的传统文化蕴涵，表达了人类共有的从内心出发的情感体验，和个体共同的、与身俱来的生命情感；古人把“爱”提升到仁义道德的人格品质修养上来，并且由“爱”产生的言语和行为有明显的褒美色彩，体现了古人对“爱”的言行的推崇。

【参考文献】

[1] 谭学纯. 语言教育：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5).

(下转247页下)

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

刘凤娇(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并不惜笔墨地用了四个比喻来说明两者的概念和关系。虽然这两者的区分在语言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两者的差别和联系。我们要避免过于绝对地理解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间的对立,这样才不至于违背语言研究的科学规律。

【关键词】索绪尔;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唯物辩证法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语言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906—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这一门课程中。1913年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谔等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它材料编辑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将近一百年间,举凡欧美各国语言学界所接触到的各种有关原理和方法的问题,都逃不出索绪尔的视线。

对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是索绪尔的一个重要贡献。“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这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这样,语言学就被分成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关注的是同一时期语言系统中各项共存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研究语言的价值等。历时语言学关注的则是在时间上彼此代替的各项连续要素间的关系,更多地研究语言中要素的类比、交替、粘合等变化现象。

把语言学的研究区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研究目前已经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可,尽管在术语方面可能不同的语言学家会有分歧,但是这样的二分还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洞悉语言学本质问题的缜密思维和敏锐眼光。从此以后,世界上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的人基本上沿着索绪尔确定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路线走下去。20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可以很好地证明这样的二分是符合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原理的。因此,今天我们站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更高起点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索绪尔所区分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仍然坚信这样的区分是有益于语言学学科研究的发展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事物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开创真正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是严格区分二者的。他在教程中论述说:“这两种观点——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历时和共时的对立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固然存在对立,但它们彼此间的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索绪尔本人实际上也承认这点,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为了表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独立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可以把前者比之于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在语言学里,历史现实性和语言状态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

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我们知道,即使是投影,它和物体也是存在着某些模糊的边界成分的,因此截然划清共时和历时的界线是不可能的。索绪尔也指出“共时这个术语其实不够精确,应该用稍稍长一些的特异共时来代替。……造成语言的分歧的正是历时事实的继起以及它们在空间上的增殖。”

因此,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绝不能作僵化的片面的理解。我们应该看到它们的差别是主要的,但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人们渐渐意识到共时语言研究应该注意联系历时语言研究。邵敬敏先生提出“描写可以揭示规律,但是规律并不等于理论上的解释。规律可以靠经验——归纳获得,而解释则要进行创造性的联想、推测、假设和演绎才有可能获得。换言之,规律是经验的、具体的,而解释则是理性的、普遍的。解释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同样,进行历时语言学的研究有时也要使用共时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首先把语言学的历时发展分成一些有显著特征的断代时期,进行各个断代时期的共时描写和分析,再把某些要素的历时演变贯穿起来解释,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语言的历时发展脉络,总结出历时演变的普遍规律。我国前辈语言学者王力、向熹等已经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汉语史稿》(王力著)、《简明汉语史》(向熹著)都是成功地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典范。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索绪尔在教程中所作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的确有重大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绝对地理解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间的对立。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从事语言的共时研究中适当关注历时的研究,以共时为主;在语言的历时研究中又要兼及断代的共时研究,以历时为主,两方面兼顾,这样才不至于违背科学规律,这样才是对索绪尔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辩证理解。

【参考文献】

- [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
- [2] 邢春艳.论语言学发展中的哲学思想[J].重庆: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 [3]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4] 汪火焯.简析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影响[J].武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4).

【作者简介】

李晶莹(1986—),女,福建古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修辞。

[2] 张玉书,陈延敬.康熙字典(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增订本)[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上接246页)